

葛崇岳译文集 卷一

Collected Translation Work of Ge Chongyue

诗 歌



黄山书社

1348206



葛崇岳译文集 卷一

Collected Translation Work of GeChongyue

诗 歌



淮阴师院图书馆 1348206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葛崇岳译文集/葛崇岳译. —合肥:黄山书社,2009.9

ISBN 978-7-5461-0517-8

I. 葛… II. 葛… III. 葛崇岳—译文—作品综合
集—世界 IV. I512.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40608 号

葛崇岳译文集

葛崇岳 译

责任编辑:李玲玲

出 版:黄山书社

地 址:合肥市圣泉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邮政编码:230071

发 行: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合肥锐达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80×1230 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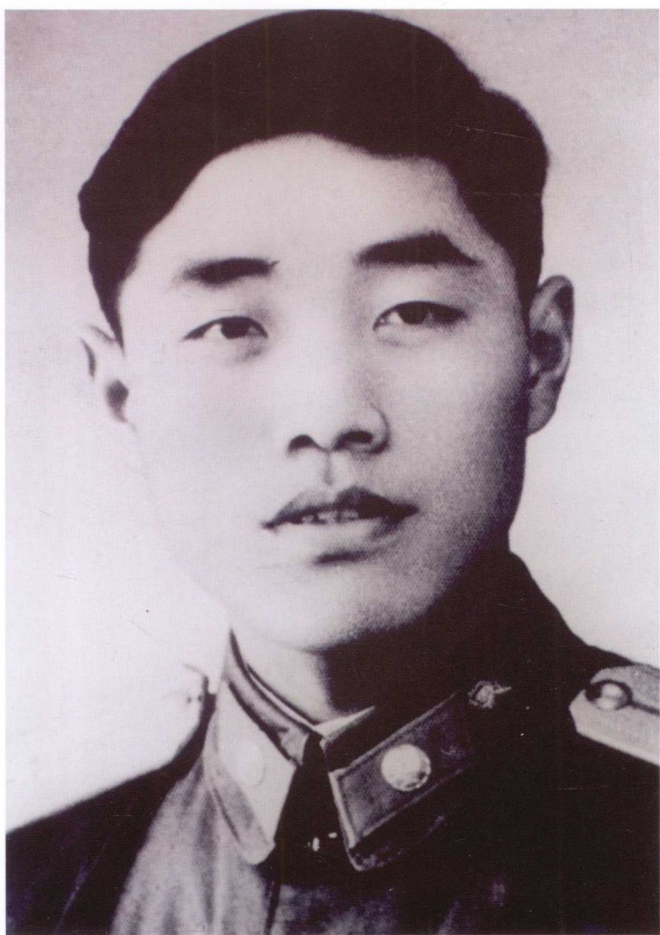
印 张:69.5

字 数:1680 千

版 次: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00.00 元(共七卷)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缪斯引渡者 风华正茂时

前 言

李榕声

怙丧恃失伯扶孤，乳母夫盲岁岁劬；
最忆严君身后好，一乡清誉一箱书。

这是葛崇岳先生七言古风体自传诗《苦乐歌》中的一节。痛失父母的孤幼，本来是人世间一件最可悲伤的事，但诗作者却为自己庆幸，因为他嗣后得到了家族中慈爱的伯父以及虽然身世贫贱但同样心地仁慈的乳母的悉心扶养和照料，并没有因为父母早歿而导致慈亲般关爱的消减，并且他还格外感谢父亲身后为他留下的一箱书籍以及流播在乡邻们日常记忆中的一份好口碑，因为它们为他日后的一心向学、怀有不同凡俗的抱负并走向注重精神向度和有尊严的人生，作了最初的、也是至关重要的引导和提示。像这样一些细小的地方，是很能传达出诗作者宅心的温润和宽厚的。

诗中还这样写道他的少年时代：

远道层关灯焰红，笃山幽雅秀明中；
驱倭烽火燃难到，娴静少年且用功。

作者出生于安徽庐江，北濒巢湖，毗邻桐城。近世中国，桐城

即因文风昌盛而被当时的读书人视为天下文脉由以维系之所在。清代中兴大臣曾国藩曾有“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之叹，自称私淑桐城，并序述其流派，称为“文章正轨”^①。作者的中学时代正是在桐城度过的，他为桐城中学八十周年校庆写的《母校之恋》，就显得格外一往情深：

龙眠山下那座古老的小城，
小城里那所名播遐迩、
开我茅塞、导我前程的学府：桐中

像白云依偎着山岫，
像游子思盼着慈母，
我日夜眷恋母校呵！
我的思念，不是漂溅的水花，
澄泓的桃花潭水何许深深！

自传诗里写到的“娴静少年且用功”的动人景象，便可看做桐城百年流风所披的一个小小缩影。由于远离东西南北的所有交通要道，地理位置较为偏僻，以致在抗日烽火燃遍大江南北的岁月，作者的家乡居然躲过了日寇铁蹄蹂躏的厄运；此一艰难卓绝的世道中殊出意外的陶渊明世外桃源式的传奇，使得这位生性明慧的少年人得以勤奋读书的环境终未中断。

1950 年新春伊始葛崇岳离开了出生地，前往华东军政大学，投身到一种完全不同的时代文化的氛围之中，并且开始了一种陈寅

^① 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

恪先生所谓“预流”^①的新时代的学习生涯：

飞扬神采口悬河，天下纵观感慨多；
频嘱诸生攻外语，毕生翻译莫蹉跎。

华东军政大学校长一职曾由陈毅元帅兼任，预科结业时，适逢陈毅倡办军区政治部外语学院，葛崇岳旋即被选调入院，攻读俄语于此，每每忆及这位谈笑风生的儒帅，油然而生的崇敬与感激之情，在葛崇岳，直至今日依然有增无减。20世纪五十年代，葛崇岳在任职雷达专科学校俄文教员和苏联顾问通译期间，即已有俄苏文学译作在京、沪等地的名刊名社，如《译文》（今《世界文学》前身）与作家出版社^②刊出。但差不多从六十年代中期至整个七十年代，却不再有关于俄文学的译作问世。这里边既有两国间兄弟阅墙风波骤起的阴影笼罩，又有国内时政激荡颠簸的原因。直到八十年代初，沉寂多年的葛崇岳，仿佛久抑的火山突然间再度喷发似的，一下子向我们贡献出了二三百万字的译著。我们不妨以他自传诗作为“经”，以他的译著和诗作作为“纬”，前者是时间性的简明索引，后者则有如笺注，是他长年主持省报文艺版之余，孜孜矻矻于著译的人生岁月的详尽见证。

崇岳先生尤钟情于诗，至今作诗、译诗不辍。晚近受朋友的鼓动，复又涉足小说翻译，并且乐此不疲，大有一发而不可收拾之势。以下是崇岳先生20世纪五十年代至今，差不多半个世纪的译著活

① 参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

②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作家出版社，系中国作协直属机构，其时受作家诗人尊崇的程度，或还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之上，远非20世纪八九十年代重新恢复建制后的作家出版社所可比拟。

动的一份不完整的清单:

译作:《苏俄抒情诗十杰》、《蒲宁诗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斯捷尔纳克诗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近一百首)、《丘特切夫诗选》(与普希金、莱蒙托夫齐名的俄罗斯三大诗人之一,近二百首)、《费特诗选》(俄罗斯唯美主义诗歌之父,近三百首)、《奥列西抒情诗选》、诗体《普希金童话诗》、特瓦尔夫斯基长诗《列宁和炉匠》及巴尔蒙特、巴拉丁斯基与命运多舛的茨维塔耶娃诗选、童话《天鹅姑娘》,高尔基长篇小说《童年》、《我的大学》、《在人间》,托尔斯泰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宁娜》、《托尔斯泰童话》,契诃夫纪实随笔《西伯利亚纪行》等。

创作:诗集《生活是一个圆》,旧体诗集《晶斋吟草》,散文集《天鹅之歌》等。

作为世界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文学的苏联文学,曾将一种全新的美学范型导入世界文学,并在文学的各个门类造就过自己的大家:小说领域继高尔基之后的法捷耶夫、肖洛霍夫直至新近去世的艾特玛托夫等,诗歌领域的勃洛克、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戏剧领域的布尔加科夫,等等,不胜枚举。而《静静的顿河》、《日瓦戈医生》、《大师与玛格丽特》式的鸿篇巨制,则为世界文学史贡献了新的经典。苏联时代有良知的诗人小说家们,秉承俄罗斯文学源远流长的精神传统,以自然、人性、道德、良知作为写作母题,对诸如世界、历史、人性、革命等重大主题,作出了自己有深度的探究。由于共同的社会主义实践,也由于此一实践所遭遇到的相似相近的命运波折,新中国文学与苏联文学之间,语境上无形中存在着一种仿佛前定似的亲和性。俄苏文学曾经是新中国文学一个重要,不,最主要的影响源。20世纪五十年代举国蜂拥的学俄语热,盛况之空前,决定了它很可能也是绝后的。大批经由俄语科班培

训的翻译从业者,纷纷加入到俄苏作品的翻译梯队之中。出版机构的俄文学翻译发行的数字蔚为壮观。

发生在中、俄两大精神文化类型之间的近现代交涉,其规模之大和相契之深,还得从其源远流长的精神、文化自身各自所具的,而最终又是可以相通的因缘那里去寻求解释。

俄罗斯思想家尼古拉·别尔嘉耶夫曾在《俄罗斯的命运》一书中,对俄罗斯民族的文化命运作了严密的思索和论述,深深幽闭着的俄罗斯灵魂之奥秘,不是单凭理性的语言所能究明的,情况就像葛崇岳先生所喜爱的,并译有其近二百首诗作的诗人丘特切夫在他的一首诗作中所写的那样:

凭理智不能认识俄罗斯,
普通的尺子也无法丈量:
她有着独特的风姿,——
对俄罗斯你只能去信仰。

俄罗斯知识分子是近世以来世界上最具社会良知和责任感的。俄罗斯文学也因此而成为最富于社会学情怀的文学。自19世纪中期以降,无论是别、车、杜的美学,还是列宁的反映论和党性原则,都将文学视为具有巨大教育、影响功能的社会学工具。俄罗斯知识分子不仅是俄罗斯社会的良心,也是世界知识分子的典范。即使处在前苏联极权国家时代,诗歌、小说、音乐等中的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肖斯塔科维奇、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依然留下了他们自己的声音。他们所高翥远举的人性尊严原则,不仅仅为了自我解脱,要是那样的话,他们早就可以孤身远引,从此离开尘嚣,但是不,他们向往的是回到承受着万千劫难的俄罗斯民众

之中,让他们在艰难之余,共享自己所能发现的精神的清洁和庄严,高贵的人性所能设想和规划的社会乌托邦图景:

我要到人群中去,

和他们为伍,

.....

那些无名无姓的人,与我为伍,

还有大树、儿童,和不出门的人,

我屈从于他们每一位,

而这,才是我企求的胜利。^①

而这同样也是中国远古以来仁人志士的一种向往。即使受到内在、外在条件的限制,做不到“兼济天下”,至少也要把一己所得之“道”贡献给四周有可能施加到影响的人们一起分享。

前面开列的那份虽不完整的清单,却足以见证崇岳先生在文学上,尤其是俄文学翻译事业上所做出的颇有建树的成绩。对于这样一位辛勤劳作的俄罗斯文学的传输人,我们是不能等闲视之的。倘若能够进而将崇岳先生辛勤劳作的成绩,放置到以上所作简单梳理的那样一层既深且厚的历史文化因缘背景上来加以解读和考衡的话,我相信,我们定会在对这份成绩本身所具有的文学、译学方面的价值、意义和精神分量作出更为真切的掂量。

正如宗教曾将苦行,甚至肉体的消亡,视为灵魂走向拯救之途的必经之路那样,革命在 20 世纪,也曾将人类的日常生活与卑微

① 见葛译帕斯捷尔纳克《黎明》一诗。按:文中凡不特别注明的引诗,均出自葛崇岳译本。

命运,与某种有关人的解放的神圣许诺维系在一起,将诸如大规模的个人牺牲,诸如漠视人的存在价值的暴力性权力的争夺或攫取,视为社会进步过程中无可避免的,因而必须义无反顾予以正面接受的代价。这样的革命,似乎在一种作了神圣化处理的象征结构中,改变了苦难和死亡原有的性质,但并没有为遭遇苦难和死亡的人们带来真实处境上的任何改变或缓解。不仅如此,事实上,以所谓历史合理性的名义随意摧毁人们有尊严地生活在世的基础,有时反而还人为加剧了命运的艰难和残酷。这,既是帕斯捷尔纳克笔下的日瓦戈医生,何以会对革命所带来的现状怀持如此复杂的感情的现实和历史的原因,也是阿赫玛托娃何以无从化解内心巨大焦虑和痛苦的现实和历史的理由。

帕斯捷尔纳克忧悒的目光见证了这个世界和时代所特有的广阔、动荡和缠绕,同时也见证了比这个世界和时代更为广阔、动荡和纠缠的人性。

葛译帕氏诗选(近一百首)的原稿,本已列入20世纪八十年代曾广有影响的“诗苑译林”丛书的后续书目中,但交稿后即一直沉睡在出版社的贮藏柜中,至今无缘一读为快,因而我不清楚葛译帕氏诗选中,是否也包括了《日瓦戈医生》第九章“瓦雷金诺”,尤其是第十四章“重返瓦雷金诺”中,医生在送别了拉拉之后,以一种人世罕见的爱情的力量,在暴风雪与狼嚎交相呼应的深夜,一气书写下的那些凄美的诗章。这些诗句何以在不平静的节奏里流动着那么动情的音符?也许是俄罗斯这样辽阔的大地上才会具有的文化底蕴和精神重负,它所特有的人性、精神的闪耀和迸发,在惊扰着我们的内心;也许是我们与诗人一起,从苦难的洪流中眺望到了无常的命运;帕斯捷尔纳克心灵经历的丰富决定了《日瓦戈医生》的丰富。帕斯捷尔纳克的表达,既不是东正教的,当然更不会是斯大林

的,也和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大相径庭。只有上帝那样博大仁慈的手,才有可能造就这样的文本。

诗歌翻译有着三个问题的面向:一是意象,二是意义,三是声音。英语世界中的弗罗斯特曾经留下过“诗,即是翻译中失去的那一部分”的名言,此论虽非专就译诗而发,但却一剑封喉,点到了诗歌翻译中某种难以逾越的死穴。时间空间的差异所导致的人类语文形态千差万别的现状,注定了诗歌被翻译时,首先,原文字中所具有的那些魅惑听者的声音性元素,将无法在另一种语文系统中得以复制和保存。即便译艺再高超的译手,也只能止步于此,无计可施。此一无可挽回的损耗,唯有通过对前二者的努力来达致间接性的补偿。虽说古典诗更为倚重声律魅惑的表达程式,而现代诗尤其注重表达内容的独特、深入与有力,而取悦听者耳朵的音乐性成分,由于其相对的外在性,已经或正在越来越不为现代诗人和他们的读者所看重,但呈现在崇岳先生译笔之下的蒲宁,却并未在原诗音律结构难以转达的铁则面前畏葸不前甚至退避三舍。崇岳先生本来就有一副很好的诗笔(这一点将另文论及),葛译蒲宁早期名篇《茨冈女》,即经由对原作诗思节奏的精准捕捉,曲尽其妙地传达出原作的神韵,使我们得以分享到了不亚于阅读古典诗作时所能享受到的音韵上精彩绝艳的那种快感,无怪乎在译诗界的同行知音那里,它也格外地受人青睐了:

前面是大路,大车,
一只老狗傍着车轮走,
前面依然是草原,
辽阔,自由和乐土。

俏丽的茨冈女掉队了，
嘴里灵巧地嗑着葵花子儿，
她说，心里像扎着一根针，
因为剧毒是她带走。

她说着，又在表演什么，
那乌黑的眸子滴溜溜，
别看它闪着太阳，闪着流金，
但却遥远，冷冰冰。

裙子何其多！那脚上
小巧玲珑的鞋子多合适，
腰肢儿不安分，在动，在流，
两颊赛珍珠，黑黝黝。

前面是大路，大车，
一只老狗傍着车轮走，
幸福，青春，自由，
太阳，草原，乐土。

茨冈女，也即吉卜赛女郎，是欧洲文化史和文学史中一种神异的存在。俄罗斯诗人中，如普希金、莱蒙托夫、涅赫拉索夫等，都曾在诗中关注过她们的命运，法国梅里美的小说名篇《嘉尔曼》和《高龙巴》以及比才的歌剧《卡门》，更是让世人为之惊心。她们谜一样的踪影，常常与洪荒般的暮色贴近着，因关联和涉及到人性的极限和认知的极限，每每给人带来战栗的快感与不安。在蒲宁这首简

洁洗练得几乎找不出一个赘词的诗作中,作为神异性存在的茨冈女,却不再飘忽不定,一晃而逝,显出难得一见的清晰。自由、辽阔的草原与同样自由、辽阔的人性彼此对应和互证,尽管灵动的身姿和流盼的眼神中依然蕴涵着太多的内涵。原作固然出彩(简净而不单调,明快而又蕴藉),但这样的出彩,须得借助崇岳先生与之锱铢相称的一手好译笔,才有可能对我们这些不方便直接阅读俄文的读者,构成某种摄人心魄的有效性。

蒲宁通常并不直接表达社会与历史事件,诗境中出现的主题多是有关自然、爱和孤独的,使用的语汇,多是与此相关的自然的语汇。自然物象,在给人以纯净的瞬间愉悦、平静的心态和生活意趣的同时,也带给我们一种意义的期待,因为进入我们视野中的自然之物,总是征兆着某种寓意和诺言的。它们不仅是可触动我们感觉的存在,还是引领和激发我们进入某种意义判断和精神构想的一个契机。它们的身上总是蕴含着某种隐身在自然秩序中的意义秩序,某种需要我们怀持虔敬之心去尊重、宝爱、惊叹和循守的法则。通过自然,蒲宁将自我与世界、生与死的不可分离、不可分割的相互关联,作出某种微妙的揭示,并将这种揭示及时提示给我们。整个情形就如同波德莱尔《通感》一诗所说,我们的自我、内心、欲望、生与死……与自然这座庄严、宏大的象征主义神殿的柱子之间,彼此感应,互为印证。

诗人费特(1820—1892)在现当代的中国,也许可以说识者无多、应者寥寥,但也正因为如此,崇岳先生之于费特的潜心研译(已译近三百首)^①,便格外显出其机杼别出和心眼独具的意味。这位

^① 据崇岳先生告知,北方文艺社、北岳文艺社均曾拟出版,但因征订数不佳,无果而终。奈何!

名字虽不为中国读书界所熟谙的 19 世纪俄罗斯“纯艺术”(又称“唯美”)诗派的主要代表,却对嗣后的俄罗斯象征主义诗派,尤其是对勃洛克(1880—1921)影响深钜,而后者则以其长诗《十二个》,在中国读书界名声极为显赫:风雪之夜,十二个赤卫队员手持红旗,行进在彼得格勒街头,他们的前方,则有头戴白色玫瑰花环的基督的隐隐绰绰的身影,在为他们导夫先路。有人解释说,出现在诗末的基督,实乃列宁之隐喻。但真相究竟如何?勃洛克之于革命,果真拥有如此这般的政治家的洞察?恐怕只有起诗人于地下才说得清楚了。崇岳先生和我都很敬重的诗人彭燕郊先生,生前曾在为葛译费特诗选所作序文中,称道其“首先不是用笔,而是在用心译诗”,为此还特意摘引一首无题诗的译本作为佐证:

呢喃软语,怯生生的呼吸,

夜莺的娇啼,

灿灿银光,翩翩涟漪,

梦里的小溪;

夜的幽光,夜的清影,

朦胧夜色无际,

神妙销魂,变幻迷人,

卿卿姿容俏丽;

似烟如云,玫瑰紫红,

琥珀的梦紫,

热吻声声,热泪涔涔,

晨光呀黎明。

的确,这样的译诗,既很好地传达了原作简净、超然的诗意,更绵延了中国古典诗歌中所看重的那份幽远的韵致,而充当沟通两者之间桥梁的,则是译者湛深的中、俄诗艺的涵养,以及积经年累月之功,潜思默想、心追手摩然后得以造就的两方面语文的造诣。你得洞悉中、俄文字之间各自曲径通幽、抵达物象和情致的精妙、幽微的途径才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更何况你所经营、所运筹的,是在古人眼里足以惊天地、泣鬼神的文字(我们的古书中,不就有着仓颉造字之日,竟致白昼下粟如雨、夜半鬼魂哭嚎不辍的记载)。

在《蒲宁诗选》的“后记”里,崇岳先生披露了他之于翻译之道的这样一番抱负:“在忠于原作的基础上,力求使译诗在情调、韵味、风格上尽可能和原作保持一致。也就是说,要造成使读者阅读译诗和欣赏原著达到差不多的境界,而不是拘泥于逐字逐句的生搬硬译,不拘泥于每行的字数和音步,及诗行结尾的韵脚,而是在忠于原作的基础上考虑诗歌艺术本身的特点和中文的习惯。”他很服膺译界前辈傅雷先生的意见:“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并将之视为翻译的最高境界。

不过,译界对此似乎迄今并未形成完全一致的意见,更不要说定论了。事实上,不同的声音同样一直存在。20 世纪初期和前期,鲁迅先生即曾力主“直译”,希望译文能够始终保持住原作难以化约和不可驯顺的异在性,他尤其反感译文给人以如同诵读本国语文那样的亲近无间浑然不分的认同感,即便自己的译著被人诤议为诘屈聱牙的“硬译”也在所不辞。鲁迅译论自然别有怀抱,有基于他不妥协的国民性批判的特定思想立场的一面,但又并非不具有普遍意义,里边确有深意存焉,值得我们深长思之。现代译界开山严复首倡“信、雅、达”三律,后二者似都与崇岳先生所说的考虑

中文习惯相关:原作的精理微言,须得刻意求显,倘若不能通过苦心孤诣的雅驯化经营,将原文转换为俨然中文写作的境界,则将无从保证其最终通畅无碍抵达阅读接受者的内心,果真如此,则作为译事第一义的“信”(实)云云,也终将徒然成为无所依傍的空中仙阁和海市蜃楼。近年译界,尤其是译学批评界崭露头角的“乔纳森”的意见,与崇岳先生所认同并努力践行的“仿佛中文写作”的抱负之间,有英雄所见略同的一面,也有微妙的差异。此君中西学造詣均甚精湛,深谙译学三昧,他的意见里似乎也含有对译者为使原作化为“仿佛中文写作”之境而充分发挥自己风格的疑惧和担忧:

翻译作品的语言就像一块双面胶,一面粘着原著的语言,另一面粘着译者自己的语言。撇开原著的语言不谈,一味称许译者自己的语言造诣,就翻译作品的评价而言,可以说是无效批评,因为译者具体的言语表现如何与原著的水平是分不开的,好的原著可以提升译者的表现,平庸的原著则有抑制作用;另一方面,译者充分发挥了自己的风格,并不等于他的译文就是忠实的,实际上,“炫技”的程度常常与准确度成反比。^①

“信、雅、达”,文字无多却相当缠夹,想要说清楚,远比想象的要难。孜孜于译事的崇岳先生始终是唯矜唯慎,并不因为自己拥有一手好译笔而逞才扬己,诸如“撇开原著的语言不谈,一味称许译者自己的语言造诣”,从来都跟他沾不上一丝半缕的边。他在译事实践中“首先应坚持‘信’。‘信’,永远是第一位的”执念,显然

^① 见《乔纳森·变风变雅》:“西书识小56:傅惟慈又如何?”<http://qiaonassen.com>。“乔纳森”,学者刘铮的网络博客笔名。